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母性焦虑驱动过度保护行为：情绪—认知—行为闭环模型

作者：滕跃 孔令楠 刘丽芬 杨彬 党琪 高军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总体来看，这篇文章尝试提出一个整合情绪、认知与行为的理论模型，将焦虑研究中的成熟框架引入母亲过度保护行为的解释之中，这种跨领域的理论迁移和机制化尝试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当前证据基础上，该理论框架仍存在若干需要进一步澄清和强化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建设性意见。

意见 1：稿件未对“母性保护行为”“过度保护”“母性焦虑”“过度或病理性焦虑”等核心概念进行清晰、递进式界定，而是在全文中交替使用或者混用这些概念。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稿件核心概念体系提出的关键性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该评论所指出的问题：原稿在概念层级与术语使用上确实存在递进关系不清、不同层级概念交替使用的情况，这不仅削弱了理论论证的严谨性，也增加了读者理解和外推的难度。针对这一问题，修订稿已对全文的概念结构进行了系统性重构。

首先，修订稿在引言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递进式界定，明确区分并建立以下层级关系：

(1) 母性保护行为，指在养育情境中为降低客观或潜在风险而采取的情境匹配、可调节的保护性反应；(2) 过度保护行为，指在低威胁或与儿童发展阶段不匹配的情境中，持续、僵化或高频率限制儿童自主性的行为模式；(3) 母性焦虑，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特质焦虑或临床焦虑障碍，亦非母性行为的普适心理基础。其更适合被视为一种母亲在育儿情境所产生的、以子女安全、健康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持续性担忧与紧张体验，且严重时可能达到临床关注水平的情景特异性的心理体验。通过上述分层界定，修订稿明确了行为层面与情绪层面的不同概念指向，避免将心理体验与行为结果混为一谈（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引言部分，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其次，在正文论述中，修订稿严格按照上述概念层级进行使用，并对“母性保护行为”“过度保护”“母性焦虑”“过度或病理性焦虑”等核心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原稿中存在的概念混用与替代性表述已被系统删除或统一替换，以确保术语在全文中的一致性和可追溯性。再次，修订稿在逻辑结构上明确指出，这些概念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因果关系。例如，母性焦虑并非过度保护行为的充分或必要条件，高水平焦虑亦不等同于母性焦虑本身。通过这一澄清，修订稿避免了从概念混用中自然推导出因果必然性的风险（具体修改内容集中在第2章与第3章，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层级清晰、功能区分明确、逻辑递进合理的概念框架，为后续机制讨论和理论整合提供稳固基础。再次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对稿件整体质量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意见 2：全文多处将母性保护行为直接等同为问题行为的起点，隐含“保护行为本身即通向过度”的理论假设。这种处理忽视了保护行为在多数情境下的高度适应性，也使“过度保护”缺乏清晰判定标准。作者需明确指出：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机制，适应性的母性保护才可能转化为过度保护，否则当前论述实际上是在否定母性保护行为本身的功能合理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本文理论基调与核心假设提出的深刻指正。我们完全认同该意见所指出的关键问题：原稿在部分表述中确实存在将母性保护行为过早置于“问题行为起点”的风险，从而在逻辑上隐含了“保护行为”本身可能通向过度的不当假设。这一处理既忽视了母性保护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境中的高度适应性，也削弱了“过度保护”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所应具备的判别边界。对此，我们在修订稿中进行了系统性修正。

修订稿在引言和理论背景部分明确重申母性保护行为的功能合理性与进化适应意义。我们强调，母性保护行为本身是一种在进化与发展层面高度适应的反应，其核心功能在于应对真实或潜在风险、保障儿童安全与生存。在多数养育情境中，这类行为不仅不构成问题，反而是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通过这一调整，修订稿避免在理论起点上将保护行为问题化（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引言部分，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同时，针对“何种条件下保护行为可能转化为过度保护”的问题，修订稿明确指出，这一转化并非必然结果，而是发生在特定条件组合下的情境性过程。具体而言，修订稿从三个层面加以限定：（1）情境条件：当客观威胁水平较低或与儿童发展阶段不匹配时(Levy, 1933)；（2）行为特征：当保护行为表现为持续性、僵化或高频率限制儿童自主探索，而缺乏情境

调整的灵活性(Clarke et al., 2013; Root et al., 2016; Wu et al., 2020); (3)个体与环境调节因素:当照顾者的情绪调节资源、认知评估能力或社会支持不足时(Crockenberg & Leerkes, 2004),保护行为更可能偏离情境需要。通过这一条件化描述,修订稿避免了任何“保护必然走向过度”的线性推论(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2章2.1节和2.2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在机制层面,修订稿将过度保护的形成为多因素交互的结果,而非保护行为本身的自然延伸。我们明确区分了保护行为的功能起点与其在特定心理状态(如高水平母性焦虑)和环境约束下可能发生的行为偏移,并将相关机制统一界定为假设性解释路径,而非既定因果模型。相应内容已在行为路径与机制讨论部分中予以修订和澄清(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4章,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通过上述修改,修订稿在理论上实现了从“行为问题化”向“情境—功能分化”的转变:既充分肯定母性保护行为的合理性,又在明确边界的前提下讨论其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风险形式。我们希望这一处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母性保护行为的双重属性,并避免对其适应性功能的否定。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对稿件理论根基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

意见 3: 稿件将母性焦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但始终未区分其是状态焦虑、特质焦虑,还是育儿情境中特异性的焦虑体验,也未说明是否涉及临床水平的焦虑。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属性提出的关键性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该评论所指出的问题:原稿在使用“母性焦虑”这一概念时,未能充分区分其在状态—特质维度、情境特异性以及临床层级上的不同属性,确实可能导致对研究对象性质的误解。针对这一问题,修订稿已对母性焦虑的构念属性进行了系统澄清。

在状态—特质维度上,修订稿明确指出,本文所讨论的母性焦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特质焦虑,也不等同于短暂、情境诱发的瞬时状态焦虑。相反,我们将其界定为一种以育儿情境为核心的、相对稳定但情境嵌入的焦虑体验,其强度和表达可能随具体情境波动,但其核心担忧对象与认知加工重点持续指向子女安全与发展。通过这一界定,修订稿避免将母性焦虑混同于个体广泛的焦虑倾向。

在情境特异性方面,修订稿进一步强调,母性焦虑属于育儿情境中特异性的焦虑体验,其焦虑内容、触发条件及行为关联均不同于一般生活领域中的广泛性焦虑。我们在正文中将“母性焦虑”与“焦虑状态下的母亲”或“焦虑母亲”等非特异性表述严格区分,并统一使用“母性焦虑”及“母性焦虑个体”来指代这一构念,以增强术语精确性。

此外，针对是否涉及临床水平焦虑的问题，根据现有研究，部分研究视其为一种特定于育儿情境的情绪状态，核心表现为对子女福祉的持续性紧张与过度警觉(Song et al., 2022)。然而，更多的实证研究选择将其操作化定义为母亲所体验的、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焦虑症状水平，并探讨其与育儿行为的关联(Bilsky & Friedman, 2022; Egotubov et al., 2023; Jones et al., 2021)。因此，主要采纳母性焦虑的临床症状学视角。因此，本文将“母性焦虑”界定为：母亲在履行育儿职责过程中，所产生的、以子女安全、健康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达到临床关注水平的持续性担忧与紧张体验。(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3章3.1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最后，在机制讨论中，修订稿已将母性焦虑的作用明确限定为潜在风险调节因素，而非稳定的特质变量或诊断性类别。相关机制解释均以“可能”“在特定条件下”等假设性语言呈现，并被明确区分于已有临床证据支持的结论性陈述。通过上述修改，修订稿在构念层级、情境指向和临床边界方面对母性焦虑进行了更为精细的界定，从而提升了理论解释的准确性与可理解性。我们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中，我们也会强调对“母性焦虑”这一构念进行多维度解构与理解（如区分其状态性与特质性成分）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这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全面、更精细的研究框架，从而更准确地揭示不同焦虑成分在过度保护行为中扮演的差异化角色，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6章6.4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对稿件理论严谨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

意见4：全文反复使用“过度反应”“加工异常”“调控失衡”等表述，但并未给出任何可操作的判断标准或实证研究支持。当母亲感知到后代可能面临威胁时，其应激反应与保护行为在多数情境下都是正常且适应性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本文语言规范性与证据基础提出的关键性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该评论所指出的问题：原稿中多处使用了“过度反应”“加工异常”“调控失衡”等规范性或评价性表述，但未能同步提供明确的操作性判据或直接实证支持，确实容易在理论上将本应具有适应意义的应激反应和保护行为问题化。这一问题已在修订稿中得到系统性修正。

在术语使用层面，修订稿已对上述评价性表述进行了全面梳理与替换。凡涉及缺乏统一判定标准或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形，均不再使用，而改为描述性、条件化表述，例如“在低威胁情境中的高强度反应”“与情境需要不匹配的持续性反应”“调节灵活性降低”等，以避免隐含价值判断。其次，在判定标准方面，修订稿明确指出，本文并不试图为“过度反应”或“调控失衡”提供单一、跨情境适用的诊断阈值。相反，我们将其界定为相对性、情境依赖

性的描述性概念，其判断需结合至少三个维度：（1）情境威胁水平（是否存在真实或发展阶段匹配的风险）；（2）反应强度与持续性（是否在低威胁情境中长期维持高水平反应）；（3）调节灵活性（是否能够随情境变化进行调整）。通过这一原则性说明，修订稿避免将正常的应激反应误读为“异常加工”（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4章，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在证据层级方面，修订稿对所有涉及潜在心理或神经机制的论述进行了重新标注与降级处理。对于已有实证研究支持的结论性观点，我们明确保留并注明其证据基础；而对于尚缺乏直接证据、主要基于一般焦虑或相关领域推论的解释，统一修订为假设性或框架性表述，并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证据来源与局限性，以避免读者误解其为既定事实（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4章4.3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最后，修订稿在整体理论基调上明确强调：当母亲感知到后代可能面临威胁时，其应激反应与保护行为在多数情境下是正常且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本文关注的并非这些反应本身，而是在特定条件下，部分反应可能因情境不匹配或调节资源受限而偏离其原有功能的情况。通过这一澄清，修订稿避免了对母性应激反应的功能合理性进行否定（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3章3.1节第2段，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在语言规范性、操作性与证据透明度方面显著提升稿件质量，使相关讨论既保持理论开放性，又避免不必要的病理化或价值化解读。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对稿件科学性与学术责任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

意见 5：稿件提出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更容易产生焦虑”，并将其视为过度保护行为的重要基础。然而，无论动物研究还是人类母性研究，大量证据支持的是母亲在威胁情境中表现出警觉性和防御性增强，而非情绪性焦虑本身。并非所有母性行为都以焦虑为基础，该类表述明显扩大了文献结论的适用范围。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核心推断逻辑提出的这一关键性纠偏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该评论所指出的问题：原稿在部分表述中确实存在将母性情境中的警觉性与防御性增强泛化为“更容易产生焦虑”的倾向，从而在理论上扩大了现有文献结论的适用范围。这一处理未能充分区分适应性警觉反应与情绪性焦虑体验，也可能导致对母性行为动因的误解。对此，我们在修订稿中进行了系统性修正。

首先，在概念层面，修订稿明确区分了母性警觉/防御性反应与母性焦虑体验这两类不同但可能相关的心理—行为现象。我们强调，大量动物研究与人类母性研究所支持的核心结

论是：母亲在潜在威胁情境下表现出更高的警觉性、防御性与风险监控能力，这一过程本身具有明确的进化适应意义，并不等同于情绪性焦虑。相应地，修订稿不再使用“母亲更容易产生焦虑”这一概括性表述，而改为强调母性情境下威胁敏感性与保护动机的增强（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2章2.1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其次，在逻辑关系上，修订稿明确指出，并非所有母性保护或防御行为都以焦虑体验为基础。母性焦虑仅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作为一种调节性或放大性因素影响行为表达，而非母性行为的普遍心理基础。通过这一澄清，修订稿避免将母性行为的动因单一化或情绪化，也避免将保护性反应错误归因为焦虑驱动（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3章，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最后，修订稿在整体理论框架中将母性焦虑重新定位为非必要、非普遍、情境依赖的心理变量，其作用被限定在特定个体与特定条件下，可能参与过度保护行为的形成过程，但并不构成母性行为的普遍心理基础。这一调整使全文论述更加贴合现有证据，也更符合母性行为研究的主流观点。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能够在充分尊重现有动物与人类母性研究证据的基础上，谨慎讨论母性焦虑在特定情境中的潜在作用，避免对文献结论的过度延伸。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对稿件理论准确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意见。

意见 6：尽管文中提及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等因素，但未在模型中明确其功能位置，也未讨论儿童发展阶段、客观风险水平或文化规范对“过度保护”判断的影响。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本文模型结构完整性提出的这一重要意见。我们完全认同：原稿虽然提及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等关键变量，但未能在理论模型中明确其功能位置，也未系统讨论儿童发展阶段、客观风险水平及文化规范等情境因素对“过度保护”判定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修订稿已对模型结构与相关论述进行了系统性补充。

首先，在模型结构层面，修订稿明确将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作为母性焦虑驱动过度保护行为的潜在调节变量。具体而言，社会支持被证实是缓解母性焦虑的重要外部资源。来自伴侣、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能够有效降低母亲的焦虑水平(Bridgers & Fox, 2024; Huang et al., 2022)，并缓冲父母自身情绪困扰对不良育儿行为的负面影响(Negi & Sattler, 2025)。而指个体对自己成功完成特定行为能力的认知与信任(Bandura, 1977)。该概念可关联母亲所需的养育技能与任务，以及其对成功实施这些行为的信念。班杜拉(Bandura, 1977)强调，母亲必须相信自身行为能达成预期效果，并对执行特定行为或技能的能力抱有信心。母亲自我效能感

对育儿满意度至关重要，并能有效预防产后抑郁、压力和焦虑(Tognasso et al., 2022)。修订稿在模型示意与正文说明中已明确标注二者在“威胁评估—情绪反应—行为表达”路径中的调节位置，以增强模型的结构清晰度。（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4章4.4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同时，在图1“母性焦虑驱动过度保护行为产生的情绪—认知—行为闭环模型”也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尽管现有文献中直接验证这些变量在“母性焦虑-过度保护”路径中调节作用的研究尚不充分，但这恰恰构成了本研究模型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延伸与未来实证方向。

其次，针对审稿人指出的情境判定因素，修订稿在“过度保护”相关讨论中系统补充了儿童发展阶段、客观风险水平与文化规范的作用说明。我们明确指出，对同一保护行为的功能性判断必须置于具体发展阶段与情境背景之中：在早期发展阶段或高客观风险环境下的高强度保护，可能具有适应意义；而在低风险或发展阶段不匹配的情境中，类似行为才可能被界定为过度。通过这一情境化处理，修订稿避免了对保护行为进行跨阶段、跨情境的一般化判断。再次，在文化层面，修订稿明确指出，不同文化规范对自主性、依附关系及风险容忍度的期待差异，可能影响对“过度保护”的社会评价与研究判定。相应地，本文在讨论中将文化规范视为影响行为的重要背景条件，而非固定不变的评价标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2章2.3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最后，通过引入上述调节与情境变量，修订稿将“过度保护”的形成重新定位为多因素、情境依赖的结果，而非单一心理变量或线性路径的产物。这一调整不仅增强了模型的解释弹性，也为未来实证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文化背景与家庭结构中检验模型提供了更清晰的理论接口。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使模型在保持理论简洁性的同时，具备更充分的情境敏感性与结构完整性。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有助于提升模型质量与学术严谨性的宝贵意见。

意见 7：第3.2节对“注意加工偏好”的论证部分通过描述焦虑母亲频繁干预儿童活动，直接推断其存在威胁注意偏向，但这更多是行为结果描述，而非认知加工机制证据。注意偏向需要特定实验范式和加工过程数据支持，而非基于行为后果的推断。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第3.2节论证逻辑提出的这一关键方法学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该评论所指出的问题：原稿在部分表述中，确实存在由行为结果直接推断认知加工机制的风险，将频繁干预等行为表现等同于威胁注意偏向，未能充分区分行为层面描述与认知加工层面的证据要求。这一问题在修订稿中已得到系统性修正。

首先，我们已删除或修订原稿中将母亲干预行为直接作为威胁注意偏向证据的表述，明

确指出：行为层面的高频干预只能反映保护动机或风险规避倾向，并不能单独作为注意偏向存在的直接证据。通过这一澄清，修订稿避免了从结果推断过程的逻辑跳跃。其次，在证据使用方面，修订稿对“注意加工偏好”的论证路径进行了重构。我们将注意偏向的讨论严格限定在已有采用标准实验范式的研究证据基础上，并明确指出这类证据主要来自点探测任务、情绪 Stroop 任务或眼动追踪等实验方法所获得的加工过程指标(Armstrong & Olatunji, 2012; Gemignani et al., 2024; Grupe & Nitschke, 2013)。与此同时，修订稿将母性行为研究中观察到的干预频率、风险回避等现象，重新定位为可能与注意加工偏向相关的行为相关性线索，而非机制层面的直接证明（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4 章 4.2 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在语言表述上，修订稿对所有涉及注意偏向的推断统一采用假设性和关联性表述，如“可能反映”“可能与威胁相关注意加工有关”，并在相应位置明确标注其证据来源与局限性。相应地，原稿中存在的确定性推断语句已被系统删除或替换。最后，修订稿在第 4 章 4.2 节结尾明确指出，“目前关于母性养育情境中注意加工偏向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未来研究需通过引入标准化注意加工实验范式与多模态指标，对母性情境中的威胁注意偏向进行更为严格的检验”。通过将该内容明确纳入未来研究方向，修订稿清晰地区分了现有证据与理论推测的边界。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修改稿 4.2 节（原稿 3.2 节）在逻辑上更加符合认知加工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要求，避免将行为结果误作加工机制证据。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对稿件理论严谨性具有重要提升作用的意见。

意见 8：稿件提出“焦虑缓解即奖赏”的负强化机制来解释过度保护行为的固化，但相关证据主要来自一般焦虑或动机研究，缺乏针对母性过度保护行为的直接实验证据。在缺乏明确范式和母性情境数据的情况下，该部分更应被界定为理论假设，而非确定性机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该解释部分提出的这一关键性方法论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该评论所指出的问题：原稿在讨论“焦虑缓解即奖赏”的负强化机制时，确实存在将一般焦虑与动机研究中的机制解释过度外推至母性过度保护情境的风险，在证据层级与表述强度上均有必要进行严格区分。针对这一问题，修订稿已进行了系统性修正。

首先，我们在修订稿中明确区分了一般焦虑/回避行为研究中的负强化机制证据与母性养育情境中的行为现象。并在正文中清楚标注相关证据主要来自一般焦虑障碍、回避行为及动机调节研究，其研究范式与被试情境并非特定于母性养育背景。因此，这一机制目前尚不

能被视为对母性过度保护行为的直接实证解释。

在机制表述强度方面，修订稿已将原有可能被解读为确定性因果机制的表述，统一修订为假设性、可能性或框架性语言。我们明确指出，该负强化路径仅作为一种潜在的理论解释视角，用于帮助理解在特定条件下，保护行为为何可能被重复和固化，而非对母性过度保护行为形成过程的既定机制描述。相应修改已在修改稿第 4.3 节中系统落实。

同时，将该负强化机制明确纳入理论假设与未来研究方向的范畴。我们补充指出，若要验证“焦虑缓解即奖赏”在母性过度保护行为中的适用性，仍需发展明确的母性情境实验范式，并结合行为、情绪与神经指标对该过程进行直接检验。通过这一调整，修订稿清晰地区分了现有证据支持的结论与尚待实证检验的理论推测。最后，修订稿在整体论述基调上避免将该负强化机制作为模型的核心或必然路径，而是将其与其他情境和个体调节因素并列呈现，以防止读者将其误解为对母性过度保护行为的单一或决定性解释（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4 章 4.3 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在充分尊重现有文献证据边界的基础上，保留该机制作为理论探索的启发价值，同时避免对母性情境作出超出证据支持范围的因果断言。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对稿件机制严谨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意见。

意见 9：文中将杏仁核、前额叶和奖赏系统分别单一对应于焦虑、调控失败和行为固化，忽略了这些神经结构在正常母性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也低估了同一神经环路支持多种心理功能的事实。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对本文神经机制论述提出的这一关键性指正。我们完全认同该意见所指出的问题：原稿在神经结构—心理功能的对应关系表述上，确实存在功能映射过于单一、简化甚至工具化的风险，未能充分体现杏仁核、前额叶及奖赏相关系统在正常母性行为中的多重功能，也未能反映神经环路在不同情境下支持多种心理与行为过程的基本事实。针对这一问题，修订稿已对相关论述进行了系统性修正。

首先，在总体理论立场上，修订稿明确强调：杏仁核、前额叶与奖赏系统并非“问题行为专属回路”，而是参与正常母性动机、情绪调节与照顾行为的重要神经基础(Gholampour et al., 2020; Kim, 2016; Pereira & Ferreira, 2016)。我们在正文中补充说明，这些结构在母性行为中的核心功能包括威胁监测、情绪价值评估、动机分配与行为灵活性调节，其作用并不以“焦虑”“失败”或“固化”等负性标签为前提。通过这一调整，修订稿避免将正常母性神经机

制病理化。

其次，在具体结构功能表述上，修订稿已明确修正原稿中可能被解读为“一一对应”的叙述方式。我们不再将杏仁核简单等同为“焦虑中枢”，而是将其界定为参与威胁与情绪反应加工的关键节点；不再将前额叶表述为“调控失败的发生地”，而是强调其在不同情境下对行为选择、风险评估与灵活调节的多重作用；同样，奖赏系统被重新定位为支持母性动机、照护价值评估与行为维持的通用神经系统，而非单一“行为固化机制”。相应表述已在神经机制相关段落中统一修订（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5 章 5.1、5.2 及 5.3 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最后，在模型层级与推断强度方面，修订稿明确指出，本文对神经系统的讨论旨在提供功能网络层面的整合性解释框架，而非建立“单一结构—单一心理功能”的映射模型。我们已在文中明确强调，同一神经环路可在不同情境、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调节状态下支持多种心理功能，其具体表现取决于网络动态、情境输入及调节条件。这一澄清有助于避免对神经机制的过度简化解读（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5 章 5.4 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使神经机制部分更真实地反映当代神经科学对功能多样性与网络动态性的共识，同时避免将正常母性神经基础误读为问题行为的“神经根源”。再次感谢审稿人提出这一对稿件神经机制严谨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意见。

.....

审稿人 2 意见：

此综述立意新颖，贴合当前育儿焦虑以及青少年心理问题频发的热点，同时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理论，因此相对来说具有理论价值。但是此综述在概念、逻辑以及整体基调方面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修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建设性意见。同时，非常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关键问题。修订过程中，我们将此部分作为核心修改原则，对全文逻辑结构和论述基调进行了系统性调整。

意见 1：首先，作者将“母性焦虑”作为文章的主题，可是正文第一句话却落在了“过度保护”的概念上，那么无形中就让人将母性焦虑与过度保护等同起来了，产生了一种母性焦虑一定会产生过度保护的错觉。之后的段落里并没有对“母性焦虑”给出明确的概念，而是简单解释为女性生育之后产生了各种脑结构变化，出现了“母性焦虑”。那么从简单的逻辑分析来说，就是生育导致女性脑结构变化，进而导致母性焦虑，然后导致过度保护，再导致儿

童终其一生的心理问题。整个引言部分看完就是这种感觉。如果这样的观点发表会让更多的人去指责母亲，认为孩子的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都来自母亲的照顾出现了问题，也会让天下的母亲心寒。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引言部分提出的这一关键且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意义的意见。我们完全理解并认同您的担忧：原稿在结构安排与表述方式上，确实容易在无意中传递出“母性焦虑—过度保护—儿童长期心理问题”这一线性、确定性的因果印象，从而引发对母亲群体的指责性解读。这问题是原稿中最需要优先修正的核心问题之一。

针对该意见，修订稿对引言部分的逻辑起点、概念顺序与理论基调进行了系统性重构。首先，修订稿不再以“过度保护”作为开篇切入点，而是从母性养育中普遍存在的保护性行为及其进化适应意义入手，明确指出母性警觉与保护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境下是促进儿童安全与发展的积极因素。通过这一调整，修订稿避免在文章开头即将母性焦虑与问题性养育行为并置或暗示等同（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引言第1段，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其次，修订稿在引言中明确补充了对“母性焦虑”的清晰界定，将其限定为一种特定于养育情境、以子女安全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高水平焦虑体验，而非对生育后所有女性普遍心理状态的概括性描述。同时，我们明确指出，生育相关的脑结构与功能变化本身并不等同于母性焦虑，更不构成其直接原因；这些神经变化在多数情况下具有适应性意义，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与情绪调节困难或高水平焦虑体验相关联。相关表述已在引言及第3章相应部分中予以修正（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3章3.1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再次，针对审稿专家指出的“线性因果链条”问题，修订稿明确否定了“母性焦虑必然导致过度保护，进而决定儿童终生心理问题”的观点。我们在引言中强调，母性焦虑并非过度保护行为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其与儿童心理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高度依赖于多重因素，包括儿童气质特征、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文化规范以及母亲的认知评估与调节能力等。通过这一澄清，修订稿避免将复杂的发展结果归因于母亲个体或单一养育因素。

最后，修订稿在整体论述基调上避免任何将母亲置于“问题根源”位置的表述。我们明确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对母亲行为进行价值评判，而是尝试在特定条件与情境下，理解母性焦虑可能如何通过复杂的心理—行为路径影响养育决策，从而为支持性干预与风险识别提供理论视角，而非制造指责或道德压力。

通过上述系统性修改，我们希望引言部分能够在科学探讨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更恰当的平衡，避免对母亲群体造成无谓的伤害或误导。再次衷心感谢审稿专家指出这一关键问题，

使我们得以从更审慎、更负责的角度对稿件进行全面修订。

意见 2：概念模糊：开篇没有先给出“母性焦虑”的明确概念或者说定义，整体看完不知道母性焦虑是正常心理还是异常心理，看起来似乎是每个生育女性都会出现的，但是到了文章后期似乎又将其与“焦虑母亲”等同了起来。那么“母性焦虑”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程度的差别，和“焦虑母亲”又什么概念上的异同，这些都是需要仔细阐明，避免产生歧义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核心概念提出的精准意见。我们完全认同：原稿未在开篇明确界定“母性焦虑”，且在不同段落中对其正常/异常属性、程度连续性以及与“焦虑母亲”这一称谓的关系缺乏一致且可操作的说明，确实容易造成读者误解。针对该问题，修订稿已对概念界定与术语使用进行了系统性重构与统一。

我们在修订稿引言及第 3 章 3.1 节中对“母性焦虑”给出了明确界定。并将母性焦虑限定为一种特定于养育情境、以子女健康、安全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高水平焦虑体验，其关键特征包括持续性担忧、过度警觉以及与育儿决策和亲子互动显著相关的情绪与行为倾向。该界定旨在将本文讨论对象与一般意义上的育儿担忧或短暂警觉区分开来，避免将普遍存在的适应性保护反应误读为研究对象本身。

其次，针对“母性焦虑是正常还是异常”的问题，修订稿明确说明：基于前人对母性焦虑及过度保护的主流研究(Jones et al., 2021; Kiel et al., 2025; Lindhout et al., 2006; Möller et al., 2015; Onat et al., 2025; Shaun Sweeney & Charlotte Wilson, 2023)，文采用临床或亚临床症状学视角来讨论母性焦虑，即重点关注焦虑体验在强度、持续时间与功能影响方面已达到显著水平、并可能影响养育行为与亲子互动质量的情形。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确指出，母亲在育儿过程中的适度担忧与警觉在多数情境中具有适应性意义，不应与本文所讨论的高水平母性焦虑等同。通过这一澄清，修订稿避免了“所有生育女性都会出现母性焦虑”的暗示性泛化。再次，关于“是否存在程度差别”的问题，修订稿补充说明母性焦虑在表现上可能存在连续性差异，并可包含状态性与特质性成分；但为确保论述的边界清晰，本文在核心机制讨论中主要聚焦于高水平、持续性并具有功能性影响的母性焦虑，而将程度差异与构念分解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通过这样的处理，修订稿既保留了构念的现实复杂性，也避免因边界不清而导致的概念漂移（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3 章 3.1 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最后，关于“母性焦虑”与“焦虑母亲”的关系，我们完全接受审稿专家的批评并已在全文做出统一修正。修订稿明确区分：（1）“母性焦虑”是一个指向养育情境的构念，强调

焦虑内容与对象的特异性；(2)“焦虑母亲/焦虑状态下的母亲”仅是对个体状态的泛称，可能来自多种焦虑障碍或非养育相关压力，并不必然等同于母性焦虑。为避免标签化与逻辑混淆，修订稿已删除“焦虑母亲”等概括性表述，统一采用“母性焦虑个体”等中性且可操作的称谓。

通过以上修改，我们希望能够在概念边界、术语一致性和逻辑严谨性方面显著提升稿件质量，避免读者对号入座或将个体差异泛化为普遍结论。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工作的细致审查和建设性建议。

意见 3：逻辑混淆：前边提到，作者开篇落在“过度保护”，这是其中将“母性焦虑”与过度保护直接联系起来的暗示。之后提到有研究说“母性焦虑是过度保护行为产生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且这是全文全部逻辑的基石，构成了全部的逻辑链条。那么问题来了：母性焦虑一定引起过度保护吗？一个因素是一个现象的重要驱动因素，就意味着这个因素一定会引起这个现象吗？全文时而提到母性焦虑，时而又提到焦虑母亲，并且没有给出概念上的区分，整体逻辑似乎是将两者等同了起来，焦虑母亲是有焦虑症的母亲吗？那么一个有母亲身份的人有了焦虑症，就一定是源于“母性焦虑”吗？这部分概念和逻辑都很不清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逻辑结构与概念使用提出的系统性质疑。我们完全认同该意见所指出的问题：原稿在开篇逻辑安排和关键概念表述上，确实容易给读者造成“母性焦虑—过度保护”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的印象，并在后续论述中未能充分澄清驱动因素与结果之间的逻辑层级差异。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在修订中重点反思和修正的核心内容之一。

针对“母性焦虑是否一定引起过度保护”的问题，修订稿已明确否定任何必然性或单一路径的因果表述。我们在引言及相关理论部分中，将原有可能被理解为确定性因果的表述，统一修订为风险关联或可能路径的描述，明确指出：母性焦虑仅是过度保护行为的潜在风险因素或驱动因素之一，而非其充分或必要条件。换言之，一个因素在统计或理论上被认为是“重要驱动因素”，并不意味着其在个体层面必然导致相应行为结果。相关修改已在引言与第3章、第4章中系统体现。

针对全文逻辑“以母性焦虑为唯一基石”的问题，修订稿对整体逻辑框架进行了重构。我们不再将母性焦虑作为解释过度保护行为的单一核心起点，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多因素交互框架中，与儿童气质特征、客观风险水平、社会文化规范以及家庭支持系统等因素共同作用。通过这一调整，修订稿避免了将复杂行为模式简化为单一心理变量驱动的逻辑误导。

关于“母性焦虑”与“焦虑母亲”之间的概念混淆问题，我们完全接受审稿专家的批评。修订稿已明确区分：（1）“母性焦虑”是一个以养育情境为核心、强调焦虑内容与对象特异性的构念；（2）“焦虑母亲”或“处于焦虑状态的母亲”仅是对个体心理状态的描述，可能源于多种焦虑障碍或生活压力，并不必然与养育情境直接相关；（3）母亲罹患焦虑障碍，并不意味着其焦虑体验必然属于“母性焦虑”，二者在概念与研究指向上不可等同。为避免逻辑与术语层面的混用，修订稿中已删除“焦虑母亲”等模糊表述，统一采用“母性焦虑个体”等更为精确的术语。

最后，修订稿在全文中避免使用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母性焦虑构成儿童心理问题根源”的线性逻辑表述。我们明确强调，儿童心理发展的结果是多层次、多因素长期交互的产物，母性焦虑至多在特定条件下作为风险因素之一发挥作用，而非决定性或单一解释变量。通过这一逻辑澄清，修订稿力求避免对母亲个体的责任过度集中或不当归因。

通过上述系统性修改，我们希望能够在逻辑严谨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更合理的平衡，确保论文在讨论潜在风险机制的同时，不制造因果错觉或概念混乱。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意见。

意见 4：基调负面：全文整体几乎都在强调“母性焦虑”造成的负面影响，仅仅是在其中简单提到了这是进化过程产生，并且又直接落到了“过度保护”：“进化机制必然又塑造出强大的母亲防范心理机制，这也构成了过度保护行为产生的深层进化根源。”完全没有提到“母性焦虑”的积极一面，是“母性焦虑”根本没有积极的一面，还是什么原因呢？所以还是不清楚是所有母亲都有母性焦虑，还是只有一部分人有。按照全文的逻辑和基调，母性焦虑会产生过度保护，对母亲本身和孩子都不好，所以如果所有母亲都有母性焦虑，那么所有母亲都会过度保护，那么就要对所有母亲进行干预，这种理念正常吗？但如果只有部分母亲有母性焦虑，这似乎又与进化论不相符。所以在概念不清的情况下，很难评价。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整体基调与理论一致性提出的深入质疑。我们完全认同您的判断：原稿在论述重心与表达方式上，确实过度聚焦于母性焦虑在特定条件下的负面关联，而未能充分呈现其在进化与养育功能中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逻辑上造成“进化机制—负面结果—普遍干预”之间的潜在矛盾。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在修订过程中重点反思和系统调整的内容之一。

关于“母性焦虑是否具有积极一面”的问题，我们在修订稿已明确区分适应性的母性警

觉/防范反应与高水平、持续性母性焦虑。我们强调，进化过程中所塑造的并非“问题性焦虑”，而是一种对潜在威胁高度敏感的警觉系统，其核心功能在于促进对子女安全的关注、风险规避以及快速反应。在多数养育情境中，这种警觉性对母亲与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适应价值。修订稿在引言与理论背景部分中补充了相关表述，以纠正原稿中“进化—过度保护”之间被简化为直接对应关系的倾向。

关于“是否所有母亲都有母性焦虑”的问题，我们在修订稿中作出明确澄清。我们指出，进化所赋予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保护性警觉潜能，而非所有母亲都会经历高水平、持续性的母性焦虑。本文讨论的“母性焦虑”主要指在强度、持续时间或灵活性上偏离情境需要，并对养育行为和亲子互动产生功能性影响的状态，仅存在于部分个体或特定条件下。通过这一区分，修订稿避免了将个体差异泛化为普遍心理状态，也避免了与进化论视角产生表面上的逻辑冲突（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3章，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针对“进化机制是否必然导向过度保护”的问题，修订稿明确否定了任何必然性推论。我们已将原稿中可能被解读为“进化机制构成过度保护深层根源”的表述，修订为更为审慎的说法，即：进化形成的保护性警觉系统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与过度保护行为相关，但这种转化高度依赖于情绪调节能力、环境支持以及认知评估方式等多重因素。相关修改已在行为路径与机制讨论部分中体现，以避免将进化适应机制简单等同为问题行为来源（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2章2.1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最后，关于干预理念的合理性问题，修订稿明确指出，本文并不主张对所有母亲进行普遍性干预。相反，我们强调研究意义在于识别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个体，母性焦虑可能转化为对母亲自身或儿童发展不利的风险因素，从而为精准支持与资源配置提供理论依据，而非将母性焦虑视为需要普遍矫正的“问题状态”。通过这一立场澄清，修订稿避免了对母亲群体的病理化或规范化要求。

再次衷心感谢您极具洞察力与建设性的评审意见。这些意见为我们进行深刻的学术反思、从根本上完善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论述逻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指引。

意见5：整体而言，概念的模糊引起了逻辑的混淆，进而引出了极为负面的基调，将母亲从保护者变成了加害者。如果作者想要对其进行修改，有以下一些建议：（1）阐明概念，开篇对“母性焦虑”的概念进行深入解析，讲清楚这是一个正常心理现象，是每个母亲都有的情绪表现，还是说这是一种异常心理，只有一部分人有，需要治疗和干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整体概念与价值基调提出的这一关键性意见。我们完全认同：

原稿由于未能在开篇对“母性焦虑”的性质与适用人群作出清晰区分，确实容易在逻辑上将母亲从“保护者”置换为“问题源头”，从而引发不必要的指责性解读。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修订稿已对“母性焦虑”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概念界定。将其限定为一种特定于养育情境、以子女安全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高水平焦虑体验，而非对生育后所有女性普遍心理状态的概括性描述。同时，我们明确指出，生育相关的脑结构与功能变化本身并不等同于母性焦虑，更不构成其直接原因；这些神经变化在多数情况下具有适应性意义，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与情绪调节困难或高水平焦虑体验相关联。相关表述已在引言及第 3 章相应部分中予以修正（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3 章 3.1 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同时，修订稿明确指出，本文所讨论的“母性焦虑”主要采用临床或亚临床症状学视角，关注的是仅存在于部分个体或特定条件下的高水平母性焦虑，而非对所有母亲情绪体验的概括性描述。通过这一界定，修订稿避免了将正常的母性担忧病理化，也避免了暗示“所有母亲都需要干预”的不当推论。在此基础上，修订稿进一步强调，母性焦虑并非母亲个体的道德或责任问题，而是一种在特定生物、心理与社会条件交互下可能出现的心理状态。本文讨论其潜在风险的目的，并非否定母性保护行为的积极意义，而是希望在不污名化母亲的前提下，识别哪些情境和个体可能需要额外支持，从而为精准干预和社会支持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力图在概念澄清、逻辑严谨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更合理的平衡，确保母亲在全文中的理论位置始终是保护者与发展支持者，而非被指责的“加害者”。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修改建议。

意见 6: 母性焦虑有什么检测标准，有什么表现，没有程度的区分，就像焦虑问卷一样，怎样明确一个人有没有母性焦虑？只有生育女性有吗？养母有吗？孩子的其他照顾者会有母性焦虑吗？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重要的方法学与概念边界问题。我们完全认同：若缺乏对母性焦虑的测量方式、表现特征及适用人群的清晰说明，相关讨论容易停留在描述层面，进而削弱理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价值。针对该意见，修订稿已从测量维度、程度区分及人群范围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补充与澄清。

首先，关于母性焦虑的检测标准与表现形式，修订稿明确指出，目前母性焦虑尚不存在完全统一、独立于一般焦虑的“金标准”诊断工具，其测量主要依赖于两类方法：一是基于一般焦虑量表的情境化应用，如在既有焦虑症状量表中突出或限定与养育相关的担忧内容

(Egotubov et al., 2023; Ierardi et al., 2022; Kiel et al., 2021; Spielberger et al., 1971); 二是采用养育情境特异性量表或访谈工具, 聚焦母亲对子女安全、健康和发展的持续性担忧、过度警觉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与行为反应(Klauser et al., 2023; Margraf et al., 2017)。修订稿在相关部分补充了对这些测量路径的说明, 以避免将母性焦虑误解为一种无法识别或无法操作的模糊概念。其次, 针对“是否存在程度区分”的问题, 修订稿将明确指出, 母性焦虑在现实中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特征, 从适度、短暂的养育担忧, 到高水平、持续性并具有功能性影响的焦虑状态, 存在不同程度的表现。本文并不主张以“有/无”的二分方式界定母性焦虑, 而是强调其在强度、持续时间和功能影响上的差异。为保证论述边界清晰, 修订稿在核心机制与风险讨论中, 主要聚焦于高水平、持续性并对养育行为或亲子互动产生显著影响的母性焦虑, 而将程度连续性与测量精细化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该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及第3章3.1节第3段, 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再次, 关于母性焦虑的适用人群问题, 修订稿已明确澄清: 母性焦虑并非仅限于生育女性。现有研究表明, 除生母外, 养母、继母以及在家庭中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女性照顾者, 同样可能在养育过程中体验到以儿童福祉为核心的焦虑体验(Kohn et al., 2024; Reindl et al., 2024)。其产生并不依赖于生物学分娩本身, 而更多与承担主要养育责任、情感投入程度以及对儿童安全与发展的持续关注有关。与此同时, 修订稿也指出, 父亲或其他主要照顾者在养育过程中同样可能体验到焦虑或压力(Fisher et al., 2024; Qu et al., 2020), 但这些体验是否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母性焦虑”, 仍需在概念界定和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区分和验证(该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及第3章3.1节第2段, 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最后, 修订稿强调, 本文使用“母性焦虑”这一术语, 主要是出于当前研究传统与文献体系的考虑, 并不意在排他性地将焦虑体验限定于生育母亲群体。通过上述澄清, 我们希望在保持概念聚焦的同时, 避免对养育焦虑体验进行不必要的性别化或生物学简化。通过以上补充, 修订稿在测量可行性、程度区分及人群适用性方面对母性焦虑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清晰和审慎的界定, 从而增强了理论讨论的操作性与开放性。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意见 7: 母性焦虑和一般的焦虑有什么区别, 和焦虑症又有什么区别?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区分问题。我们完全认同: 若未能清晰区分母性焦虑、一般焦虑以及临床意义上的焦虑症, 不仅会削弱理论讨论的精确性, 也可能导

致对母亲群体的误解或不必要的病理化解读。针对该问题，修订稿已从焦虑内容、情境指向、功能属性与诊断层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澄清。

母性焦虑与一般焦虑的核心区别在于其情境指向性与焦虑内容的特异性。一般焦虑通常指个体对多种生活领域（如健康、工作、人际关系等）的广泛性担忧，其焦虑对象和触发情境较为分散(Huneke et al., 2023)；而母性焦虑则被限定为一种特定于养育情境、以子女安全、健康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焦虑体验。因此，两者在基本情绪体验和生理唤醒层面可能具有相似性，但在威胁评估对象、认知加工重点以及行为反应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修订稿中已明确指出，本文关注的是这一情境特异性的焦虑形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广泛焦虑。

母性焦虑与焦虑症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诊断属性与功能影响程度上。焦虑症属于临床诊断范畴，其判定需满足明确的症状标准、持续时间要求以及显著的功能损害(Shaun Sweeney & Charlotte Wilson, 2023)；而母性焦虑并非一个诊断性概念，而是一个研究与描述性构念，用于刻画养育情境中以子女为核心的焦虑体验。母性焦虑可以呈现为从适度、情境匹配的担忧到高水平、持续性的焦虑状态的连续分布，其中只有在达到特定严重程度并符合诊断标准时，才可能被归入某种焦虑障碍。修订稿明确指出，母性焦虑本身并不等同于焦虑症，也不必然意味着个体存在精神障碍。

最后，从研究用途的角度看，区分母性焦虑与一般焦虑、焦虑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母性焦虑”这一概念，旨在强调焦虑体验在养育决策与亲子互动中的情境嵌入性，而非对母亲进行临床标签化。通过这一构念，本文试图理解在何种条件下，一般性的焦虑机制可能在母性角色背景下被放大、重组或呈现出不同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将母性焦虑视为独立于一般焦虑理论体系之外的全新病理现象。

通过上述区分，修订稿在概念层级上明确：母性焦虑是情境特异性的焦虑体验构念，一般焦虑是跨情境的情绪状态或特质，而焦虑症则是需要满足临床标准的精神障碍诊断（该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及第3章，并用红色字体标注）。这一澄清有助于避免将母性焦虑误解为焦虑障碍，也避免将所有焦虑状态的母亲等同为“母性焦虑个体”。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有助于提升理论严谨性的关键意见。

意见 8：如果说这个是正常心理现象，那么这种心理现象在人类进化以及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有什么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对于人类发展来说甚至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强调其正面意义和贡献；如果说这是异常心理现象，只有一部分人有，那么讲清楚其症状表现和诊断标准，避免大多数人对号入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关键且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若不明确母性焦虑在“正常—异常”连续体中的理论位置，就难以同时解释其进化合理性与潜在风险，也容易在价值判断上造成混乱。针对这一问题，修订稿已对母性焦虑的功能属性与风险属性进行了澄清。

首先，从进化与人类发展视角来看，修订稿明确指出，母性焦虑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问题性心理现象。相反，其基础形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进化塑造的母性警觉与防范系统。在人类进化史中，婴幼儿高度依赖照料者生存，且面临多种环境威胁，对潜在风险保持高度敏感的心理机制，有助于促进快速反应、增强保护行为并降低伤害概率。这种以子女安全为核心的警觉与担忧，在多数情境中对儿童生存、照料连续性以及早期发展具有重要的适应价值。修订稿在第3章3.1节第2段中补充了这一积极功能的系统阐述，以避免将母性焦虑单向理解为负性或病理性现象。其次，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适度的母性焦虑还可能通过促进环境监控、风险预判和发展支持行为，为儿童提供更安全和可预测的成长条件。

针对审稿专家关于“症状表现和诊断标准”的关切，修订稿进一步澄清：母性焦虑本身并非独立的临床诊断类别，也不等同于焦虑障碍。其识别主要依赖于焦虑体验是否持续、是否显著聚焦于养育情境，以及是否造成明显的功能性影响。只有在满足相应严重程度并符合现有诊断体系标准时，个体才可能被归入焦虑障碍范畴(Bilsky & Friedman, 2022; Egotubov et al., 2023; Jones et al., 2021)。通过这一说明，修订稿避免将母性焦虑泛化为一种普遍“异常”，也避免引导大多数母亲对号入座（该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及第3章3.1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通过上述分层处理，修订稿明确呈现了母性焦虑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其基础形式具有重要的进化与发展意义；另一方面，在特定条件下，其高水平表现可能成为需要关注和支持的风险状态。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平衡性阐述，在科学讨论与社会责任之间建立更为稳健的理论立场。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有助于深化理论框架的重要意见。

意见9：进一步捋清楚母性焦虑与过度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的母性焦虑都产生过度保护吗？还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过度保护的出现还有其他的因素吗？如果是孩子的其他照顾者呢？比如养母，没有经过生育，会有母性焦虑吗？会产生过度保护吗？建议将这些因素都阐释清楚。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母性焦虑与过度保护关系提出的这一系统性追问。我们完全认同：若未能清晰界定二者之间的逻辑层级与适用范围，相关讨论极易被误解为“母性焦虑必然导致过度保护”的单因果模型，从而削弱理论严谨性并引发不必要的伦理争议。针对该问题，修订稿已从因果性质、多因素框架及适用人群三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澄清与补充。

首先，修订稿明确否定“所有母性焦虑都会产生过度保护”的推论。我们在正文中将母性焦虑界定为过度保护行为的潜在风险因素之一，而非其充分或必要条件。换言之，母性焦虑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过度保护，其是否转化为具体行为结果，高度依赖于情境特征、个体调节能力以及外部支持条件。相关表述已统一修订为“可能关联”“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促进”等假设性语言，以避免任何确定性因果暗示。

其次，针对“过度保护是否由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问题，修订稿已将过度保护明确置于一个多因素交互框架中加以讨论。除母性焦虑外，我们补充并强调了多项已被广泛讨论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儿童气质特征与脆弱性、客观风险水平、社会文化规范、家庭支持系统以及照顾者的认知评估与情绪调节能力等(Kiel et al., 2025; Mudra et al., 2022; Van Petegem et al., 2022)。通过这一调整，修订稿避免将过度保护简化为单一心理变量的结果，而是将其视为多重因素长期互动的产物。

再次，关于非生母照顾者（如养母、继母或其他主要照顾者）的适用性问题，修订稿已作出明确说明。我们指出，母性焦虑并不必然依赖于生物学分娩经历，而更可能与承担主要养育责任、情感投入程度以及对儿童安全与发展的持续关注相关。因此，养母或其他长期主要照顾者同样可能体验到以儿童福祉为核心的焦虑体验，并在特定条件下表现出过度保护行为。与此同时，修订稿也强调，不同照顾者群体在生理基础、社会角色期待与情绪调节资源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系统比较，而不宜在当前阶段作出简化推论。

最后，修订稿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强调，本文讨论母性焦虑与过度保护之间的关系，目的并非建立一种普遍适用的行为生成模型，而是尝试在明确边界的前提下，理解在何种条件、对哪些照顾者，焦虑体验可能更容易转化为特定养育行为模式。通过这一澄清，修订稿避免将个体差异或特定情境的问题泛化为普遍规律（该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及第 2 章、第 3 章及第 6 章 6.4 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能够更清晰地呈现母性焦虑与过度保护之间非必然、非单因果、情境依赖的关系结构，从而提升理论解释力并减少误解风险。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有助于完善整体理论框架的重要意见。

意见 10: “过度保护”这个过度是否有标准，比如有什么检测方式或者指标？如果不清晰的阐明正常保护和过度保护的区别，也没有办法确定是否需要干预，也不知道怎样才算过度保护，怎样调节行为。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我们完全认同：若缺乏对“过度保护”的操作性界定与判断标准，不仅会削弱理论讨论的可验证性，也难以为干预与行为调节提供有价值的指导。针对该意见，修订稿已从概念判别原则、测量路径以及干预指向三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澄清。

首先，修订稿明确指出，“过度保护”并非由保护行为本身所定义，而是一个相对性、情境依赖性的概念。其判断需同时结合儿童发展阶段、客观风险水平以及行为反应的灵活性。在此基础上，修订稿明确区分：正常保护通常表现为对真实或发展阶段匹配风险的适度回应，且能够随情境变化而调整；而过度保护则更多体现为在低威胁或不匹配情境中持续、僵化或高频率地限制儿童自主行为。通过这一原则性区分，修订稿避免将任何保护行为简单标签化为“过度”。其次，关于“是否存在检测方式或指标”的问题，修订稿补充说明，目前对过度保护的评估主要依赖于多维度测量路径，而非单一阈值标准。一方面，已有研究广泛使用父母行为问卷或访谈工具(Clarke et al., 2013; Root et al., 2016)，从干预频率、控制程度以及限制自主性的方式等维度评估保护行为倾向；另一方面，部分研究结合情境任务或观察编码方法(Kiel & Buss, 2012; Toscano et al., 2022)，考察照顾者在低风险探索情境中是否频繁中断、代替或限制儿童自主尝试。修订稿强调，这些指标的核心并非判定“是否保护”，而是评估保护行为是否超出情境需要并影响儿童发展机会（该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引言部分及第 2 章，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再次，针对“如何判断是否需要干预”的问题，修订稿明确指出，是否需要干预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保护行为，而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在功能层面产生持续的不利影响。只有当保护行为为长期限制儿童自主性、探索机会或适应能力，并与儿童焦虑、依赖或回避倾向显著相关时，才具有干预的现实意义。修订稿据此强调，干预目标并非消除保护行为，而是提升行为的情境匹配性与调节灵活性。最后，修订稿在讨论行为调节时，避免提出任何规范化或道德化要求，而是将调节重点放在支持性策略上，如帮助照顾者更准确地评估风险、增强情绪调节能力以及提升对儿童发展阶段的理解。通过这一表述，修订稿避免将“过度保护”简化为需要纠正的个人缺陷，而是将其视为可在支持性条件下得到优化的行为模式（该部分具体修

改内容详见引言部分及第 6 章 6.3 节，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通过上述修改，修订稿在概念界定与实践指向上对“过度保护”进行了更为清晰和审慎的阐释，使其既具备理论区分度，也具备现实操作意义。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有助于提升论文实践价值的重要意见。

意见 11：明明母性焦虑看起来是一种人类进化中的保护机制，看起来却变成了一种指责，成为青少年心理不健康的根源，这看起来非常令人不适。建议避免一些绝对化的表述，阐明母性焦虑的程度差别，正常保护和过度保护的鉴别标准，如果这些没有标准的话，就会将部分人的问题泛化为所有人的问题，影响大众读者的观感。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重要且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意义的意见。我们充分理解并认同您的关切：如果对母性焦虑的讨论缺乏清晰的概念边界和程度区分，确实可能在无意中将一种具有进化适应意义的心理反应，转化为对母亲的指责性叙事，甚至被误解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单一或主要根源。我们认为这一问题是原稿中需要重点修正的核心问题之一。

针对该意见，修订稿在理论基调、概念界定与表述方式上均进行了系统性调整。首先，修订稿明确区分了适应性的母性警觉/保护反应与高水平、持续性母性焦虑之间的差异。前者被明确界定为一种在进化与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功能的心理—行为反应，其核心作用在于促进对子女安全的关注与保护；后者则被限定为在强度、持续时间或灵活性上偏离情境需要，并可能对养育行为与亲子互动产生功能性影响的状态。通过这一区分，修订稿避免将母性焦虑本身等同为问题来源。

其次，针对“正常保护”与“过度保护”的鉴别问题，修订稿补充并明确了判断标准，强调过度保护并非由保护行为本身定义，而需结合儿童发展阶段、客观风险水平以及行为反应的灵活性进行综合判断。仅当保护行为在低威胁或不匹配情境中呈现出持续性、僵化或过度干预特征时，才可能被界定为过度保护。相应内容已在引言及第 2 章相关部分中进行了补充说明。

再次，修订稿在全文中避免使用任何将母性焦虑绝对化、泛化或因果化的表述。我们明确指出，母性焦虑既不是普遍存在于所有母亲的心理状态，也并非必然导致过度保护或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直接原因，而仅是多重风险因素中的一个潜在环节。同时，在行为与神经机制讨论中，已将相关机制统一界定为假设性、情境依赖的解释路径，而非确定性因果链条，以避免将个体差异或特定情境下的问题泛化为普遍结论。

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力图在理论严谨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既保留对母性焦虑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科学讨论空间，又明确强调其在大多数情境中的适应性意义，从而避免对母亲群体造成无谓的标签化或指责（该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2、3 章，并用红色字体标注）。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关键意见，使我们得以从更审慎、更负责的角度完善论文。

意见 12：“情绪—认知—行为闭环模型”及其神经基础在母性焦虑领域具有创新性，那么在焦虑领域也同样具有创新性吗？这部分描述中也时常看到作者使用“焦虑母亲”，“焦虑状态下的母亲”，这还是之前的问题，能否将母性焦虑与焦虑的母亲等同起来，这其中有哪些概念和逻辑上的区别。如果剥离开母性这个概念，单纯看焦虑的影响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机制？因此，最好也提一下在焦虑领域是否有类似的理论，或者与焦虑领域的类似理论有怎样的异同。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这一关键问题。该意见涉及了本文理论定位、概念严谨性以及创新性边界的核心，我们对此高度重视，并在修订稿中进行了系统性澄清与修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并不试图在一般焦虑理论层面提出一种全新的基础模型。情绪—认知—行为相互作用的框架在焦虑研究领域已有较为成熟的发展，例如认知行为模型、情绪调节模型以及回避与负强化理论等(Beckand & Rush, 1985; Gray, 1970; Yee et al., 2022)，均系统阐述了焦虑情绪、威胁加工偏向与回避行为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若将本文模型简单理解为对一般焦虑理论的替代或超越，确实并不准确。

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情境化应用与理论整合层面。具体而言，我们并非提出新的基本心理过程，而是将既有的情绪—认知—行为框架，系统性地嵌入到母性角色与养育决策这一高度情境化的心理—社会场景中。母性情境具有若干区别于一般焦虑的重要特征，包括：威胁评估对象以子女为核心、行为后果具有显著的他人导向性、以及社会规范和责任角色对行为选择的持续约束。这些特征决定了，即便在表层机制上与一般焦虑存在相似性，其具体表现形式、调节路径及行为后果仍具有显著差异。修订稿中已明确强调，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这些一般机制在母性养育情境中的特异化运作方式，而非提出跨情境通用的新模型（该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及第 4 章第 1 段，并用红色字体标注）。

其次，关于“母性焦虑”与“焦虑的母亲”之间的概念混用问题，我们完全认同审稿专家的批评。修订稿中已对相关表述进行了统一修正，明确区分以下三点：（1）“母性焦虑”

指一种特定于养育情境、以子女安全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焦虑体验；（2）“焦虑的母亲”则是对个体状态的描述，可能源于多种焦虑障碍或非养育相关压力；（3）两者在概念上并不等同，前者并非后者的必然结果，后者亦不必然体现为母性焦虑。为避免标签化与逻辑混淆，修订稿中已统一采用“母性焦虑个体”，并删除或替换所有可能引发歧义概括性称谓。

再次，针对“若剥离母性概念，单纯看焦虑是否呈现相同机制”的问题，修订稿中已明确指出：在基本心理过程层面，焦虑相关的情绪反应、注意偏向与回避倾向确实具有跨情境的一般性；但在母性养育情境中，这些过程会受到角色责任、社会期望以及亲子互动结构的深度调节，从而呈现出不同于一般焦虑的行为表达和调控模式。因此，本文并不主张母性焦虑具有完全独立于一般焦虑的机制，而是强调其在特定情境中对既有机制的重组与放大。

最后，按照审稿专家的建议，修订稿在相关理论部分中补充了对一般焦虑领域经典模型的简要说明，并明确指出本文模型与既有理论在核心机制上的承继关系及其在母性情境中的差异化定位，以避免理论创新范围被误解为跨领域泛化。通过上述修改，我们希望更加清晰地界定本文模型的理论边界与创新层级，既避免对一般焦理论论的过度延伸，也确保对母性焦虑这一特殊情境的讨论具备足够的概念严谨性与解释价值。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

编委复审意见：

这个主题还是挺有意思的，作者需要对相应的概念做更清晰的界定，还有需要区分哪些是有证据支持的观点，哪些是作者的推测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建议大修后再审。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对本文主题价值的肯定以及所提出的关键性指导意见。我们充分理解并高度重视编委及审稿专家关于概念界定清晰性与证据层级区分的总体要求，并已据此对稿件进行了系统性的大幅修订。

首先，针对概念界定不够清晰的问题，修订稿对“母性焦虑”“过度保护”等核心概念进行了全面重构与统一界定。在引言及相关理论部分中，我们明确区分了：（1）适应性的母性警觉/担忧与高水平、持续性母性焦虑；（2）母性焦虑与一般焦虑、焦虑状态以及临床意义上的焦虑障碍；（3）正常保护行为与过度保护行为的判别原则与情境边界。通过上述区分，修订稿避免了概念泛化、术语混用及潜在的因果误读，使全文的理论对象与讨论范围更加明确和可操作。

其次，针对“需明确区分证据支持的观点与作者推测”的要求，修订稿对全文的论述结构与语言表述进行了系统性调整。具体而言，我们对已有实证研究支持的结论性内容进行了明确标注与限定，而对尚缺乏直接证据支持的机制解释、跨情境外推及神经基础推论，统一修订为假设性、可能性或理论框架性表述，并在相应位置明确指出其证据来源主要来自一般焦虑或相关领域研究。同时，我们将尚待验证的机制假设与研究空白集中纳入未来研究展望部分，以清晰区分现有证据与作者的理论推测。

此外，修订稿在整体基调上进行了重要调整：不再将母性焦虑单向呈现为问题性或负性因素，而是从进化与发展视角出发，强调其基础形态在多数情境中的适应性意义，并将潜在风险限定于特定条件和特定个体范围内，从而避免对母亲群体的泛化指责或病理化解读。

通过上述系统性修改，我们力求在保持理论创新性的同时，显著提升稿件在概念严谨性、证据透明度和学术责任感方面的整体质量。我们真诚希望修订后的稿件能够更好地回应编委与审稿专家的关切，并期待在后续评审中获得进一步的指导。再次感谢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Armstrong, T., & Olatunji, B. O. (2012). Eye tracking of attention in the affective disorde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and synthesis. *Clin Psychol Rev*, 32(8), 704–723.
-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 Rev*, 84(2), 191–215.
- Beckand, A., & Rush, A. (1985). A cognitive model of anxiety formation and anxiety resolution.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7(1-4), 349–365.
- Bilsky, S. A., & Friedman, H. P. (2022).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ternal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Offspring Negative Affect in Relation to Maternal Worry about Offspring and Perceptions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Child Psychiatry Hum Dev*, 53(3), 554–568.
- Bridgers, E., & Fox, M. M. (2024). Lonely, stressed-out moms: Does the postindustrial social experience put women at risk for perinatal mood disorders? *Evol Med Public Health*, 12(1), 204–213.
- Clarke, K., Cooper, P., & Creswell, C. (2013). The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scale: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and parental anxiety. *J Affect Disord*, 151(2), 618–624.
- Crockenberg, S. C., & Leerkes, E. M. (2004). Infant and maternal behaviors regulate infant reactivity to novelty at 6 months. *Dev Psychol*, 40(6), 1123–1132.
- Egotubov, A., Gordon-Hacker, A., Sheiner, E., & Gueron-Sela, N. (2023). Maternal anxiety and toddler depressive/anxiety behaviors: The direct and moderating role of children's focused attention. *Infant Behav Dev*, 70, 101800.
- Fisher, S. D., Walsh, T., & Wongwai, C. (2024). The importance of perinatal non-birthing parents' mental health and involvement for family health. *Semin Perinatol*, 48(6), 151950.
- Gemignani, M., Giannotti, M., Rigo, P., & de Falco, S. (2024). Attentional bias to infant face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previous care experiences and involvement in childcare in same-sex mothers.

Int J Clin Health Psychol, 24(1), 100419.

- Gholampour, F., Riem, M. M. E., & van den Heuvel, M. I. (2020). Maternal brain in the process of maternal-infant bonding: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oc Neurosci*, 15(4), 380–384.
- Gray, J. A. (1970). The psychophysiological basis of introversion-extraversion. *Behav Res Ther*, 8(3), 249–266.
- Grupe, D. W., & Nitschke, J. B. (2013). Uncertainty and anticipation in anxiety: an integrated neuro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at Rev Neurosci*, 14(7), 488–501.
- Huang, J., Xu, L., Xu, Z., Luo, Y., Liao, B., Li, Y., & Shi, Y. (202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egnancy-related anxiet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amily function and resilience in Chinese pregnant wome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BMC Womens Health*, 22(1), 546.
- Huneke, N., Impey, B., & Baldwin, D. (2023). Anxiety Disorders. In M.-E. Lynall, P. B. Jones, & S. M. Stahl (Eds.), *Cambridge Textbook of Neuroscience for Psychiatrists* (pp. 410–4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erardi, E., Dascalu, A., Shai, D., Spencer, R., & Riva Crugnola, C. (2022). Parental embodied mentalizing: Associations with maternal depression, anxiety, verbal mentalizing, and maternal styles of interaction. *J Affect Disord*, 311, 472–478.
- Jones, L. B., Hall, B. A., & Kiel, E. J. (2021).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nk between maternal anxiety and overprotection. *J Affect Disord*, 295, 541–551.
- Kiel, E. J., Aaron, E. M., Risley, S. M., & Luebke, A. M. (2021). Transac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aternal anxiety and toddler anxiety risk through toddler-solicited comforting behavior. *Depress Anxiety*, 38(12), 1267–1278.
- Kiel, E. J., & Buss, K. A. (2012). Associations among Context-Specific Maternal Protective Behavior, Toddler Fearful Temperament, and Maternal Accuracy and Goals. *Soc Dev*, 21(4), 742–760.
- Kiel, E. J., Risley, S. M., & Gratz, K. L. (2025). Maternal Ambivalence about Overprotective Parenting during Early Childhood: Relations to Observed Parenting and Mother and Child Emotion-Based Characteristics. *J Emot Psychopathol*, 1(2), 545–568.
- Kim, P. (2016). Human Maternal Brain Plasticity: Adaptation to Parenting. *New Dir Child Adolesc Dev*, 2016(153), 47–58.
- Klauser, N., Müller, M., Zietlow, A. L., Nonnenmacher, N., Woll, C., Becker-Stoll, F., & Reck, C. (2023). Maternal postpartum anx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 attachment: The effect of body sensations on infant attachment. *J Affect Disord*, 331, 259–268.
- Kohn, C., Pike, A., & de Visser, R. O. (2024). Parenting in the “extreme” :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psychological well - being of long - term adoptive mothers. *Family Relations*, 73(3), 1989–2013.
- Levy, D. M. (1933). Relation of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to school grades and intelligence tes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3(1), 26–34.
- Lindhout, I., Markus, M., Hoogendijk, T., Borst, S., Maingay, R., Spinhoven, P., Dyck, R. V., & Boer, F. (2006). Childrearing style of anxiety-disordered parents.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37(1), 89–102.
- Margraf, J., Cwik, J. C., Pflug, V., & Schneider, S. (2017). Strukturierte klinische Interviews zur Erfassung psychischer Störungen über die Lebensspanne. *Zeitschrift für Klinische Psychologie und Psychotherapie*.
- Möller, E. L., Majdandžić, M., & Bögels, S. M. (2015). Parental anxiety, parenting behavior, and infant anxiety: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for fathers and mother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9), 2626–2637.

- Mudra, S., Göbel, A., Möhler, E., Stuhmann, L. Y., Schulte-Markwort, M., Arck, P., Hecher, K., & Diemert, A. (2022).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the Second Year of Life Is Predicted by Prenatal Maternal Anxiety, Overprotective Parenting and Infant Temperament in Early Infancy. *Front Psychiatry, 13*, 844291.
- Negi, S., & Sattler, K. M. P. (2025). Family stress model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Dev Psychopathol*, 1–13.
- Onat, M., Bahadır, B., Akın Soyupek, Y., Avcı, H., Şenses Dinç, G., Çöp, E., & Pekcanlar Akay, A. (2025). Affective temperament, attachment, emotional problems, and parenting in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selective mutism: A case-control study. *Int J Soc Psychiatry*, 207640251341506.
- Pereira, M., & Ferreira, A. (2016). Neuroanatomical and neurochemical basis of parenting: Dynamic coordination of motivational,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Hormones and Behavior, 77*, 72–85.
- Qu, G., Wang, L., Tang, X., Wu, W., Zhang, J., & Sun, Y. (2020). Association between caregiver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feeding difficulties of preschool childre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rural China. *Arch Pediatr, 27*(1), 12–17.
- Reindl, V., Lohaus, A., Heinrichs, N., & Konrad, K. (2024). Parenting stress, dyadic coping and endocrine markers of stress and resilience in foster and biological mothers. *PLoS One, 19*(9), e0310316.
- Root, A., Hastings, P., & Rubin, K. (2016). The Parenting Behaviors of Shy-Anxious Mothe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Vagal Tone.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5*(4).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5-0296-2>.
- Song, Z., Huang, J., Qiao, T., Yan, J., Zhang, X., & Lu, D. (2022).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Anxiety and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19*(17), 11106.
- Spielberger C. D., Gonzalez-Reigosa F., Martinez-Urrutia A., Natalicio L. F., Natalicio D. S. (1971).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 145–158.
- Sweeney, S., & Wilson, C. (2023). Parental anxiety and offspring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27*, 64–78.
- Tognasso, G., Gorla, L., Ambrosini, C., Figurella, F., De Carli, P., Parolin, L., Sarracino, D., & Santona, A. (2022). Parenting Stress, Maternal Self-Efficacy and Confidence in Caretaking in a Sample of Mothers with Newborns (0-1 Month).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19*(15).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159651>
- Toscano, C., Soares, I., Baptista, J., Moutinho, V., Rippe, R. C. A., & Mesman, J. (2022). Maternal and paternal overprotection of children born preterm: Relations to child and parental factors. *J Fam Psychol, 36*(2), 312–317.
- Van Petegem, S., Albert Sznitman, G., Darwiche, J., & Zimmermann, G. (2022). Putting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into a family systems context: Relations of overprotective parenting with perceived co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anxiety. *Fam Process, 61*(2), 792–807.
- Wu, Q., Zhang, J., & Slesnick, N. (202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and child anxiety in substance-using families. *J Anxiety Disord, 73*, 102236.
- Yee, D. M., Leng, X., Shenhav, A., & Braver, T. S. (2022). Aversive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 *Neurosci Biobehav Rev, 133*, 104493.
-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已经根据前期的意见进行了逐一的修改，目前从修改版来看，文章中部分概念得到了澄清，逻辑性和严谨性有所增强，无其他修改意见。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修改稿的再次审阅与肯定。我们由衷感谢您在本次审稿过程中提出的深刻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提升本研究的理论深度、逻辑严谨性与学术规范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对于母性焦虑的界定，有必要开展更为细致的完善工作：文中作者虽把母性焦虑定义为“达到临床关注水平的持续性担忧与紧张体验”，然而，对于“临床关注水平”的具体判定标准并未明确给出，同时也没有阐释清楚该如何将其与亚临床水平的母性焦虑加以区分。因此，建议补充相关内容，以此增强该概念界定的可操作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稿件核心概念体系提出的关键性意见。我们理解审稿人关于概念操作性不足的担忧。为增强母性焦虑界定的可操作性，我们在第 3 部分开头新增了小节“母性焦虑的临床关注水平与亚临床水平的区分”，从强度、持续性及功能影响三个维度对“临床关注水平”的界定进行了细化，并明确采用连续体视角以区分情境适应性担忧、亚临床水平焦虑及需临床关注的焦虑状态。该补充旨在增强概念边界的清晰度，避免将母性焦虑简单病理化。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本文所指的“达到临床关注水平的母性焦虑”并不完全等同于精神障碍诊断意义上的焦虑障碍，而是指在强度、持续性或功能影响等方面已引起研究或临床关注的焦虑状态。同时，根据现有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判定母性焦虑是否达到“临床关注水平”，需根据符合结构化诊断标准以及使用经过验证的筛查工具进行量化评估（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3 章 3.1 节第 2 段，并用绿色字体标注）。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母性焦虑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连续分布的心理体验，其表现可从情境适应性的短暂担忧，逐渐过渡至持续性、高强度且对个体功能产生显著影响的状(Nolvi et al., 2019)。在这一连续体框架下，区分亚临床水平与临床关注水平的母性焦虑，需综合考量症状的强度、持续时间及功能影响三个维度。亚临床水平的母性焦虑主要表现为情境性、可自我调节的担忧；而临床关注水平的母性焦虑则往往伴随对风险的主观感知放大，进而影响

保护性行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3章3.1节第1段,并用绿色字体标注)。

意见 2: 文中提及“直升机父母”是西方过度保护的典型表现,也指出东方社会的过度保护也逐渐产生,但未深入分析“直升机父母”与东方过度保护行为的核心共性与差异;也未提及过度保护与不同文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多元的家庭文化取向存在怎样的关联。

回应: 我们认同审稿人关于文化维度分析有待深化的意见。在第2章中,我们新增了“不同文化情境中过度保护行为的共性与差异”小节,系统比较了西方“直升机父母”与东方过度保护行为在心理动因、文化价值基础及社会经济背景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并补充讨论了文化规范及家庭取向的调节作用,从而避免跨文化现象的简单类比。

在西方养育研究中,“直升机父母”被视为过度保护的典型形式,指父母对儿童学习、社交和日常活动的高度介入与持续监控。近年来,东方社会情境中类似的高强度保护行为也逐渐增多。然而,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过度保护简单等同,可能掩盖其形成机制与社会意义上的重要差异。从共性角度看,不同文化中的过度保护行为往往均与对风险和失败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不确定结果的低容忍度有关(Vigdal & Brønnick, 2022)。然而,在具体表现和价值基础上,二者存在显著差异。西方环境中的“直升机父母”更多源于强调个体成就和自主竞争的文化背景(Hwang et al., 2023),而东方社会的过度保护行为则更常与家庭责任伦理、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及对子代成功的道德期待相关(Hwang et al., 2022)。

此外,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资源竞争程度以及家庭文化取向,也在不同文化中对过度保护行为的表达方式起到重要影响。低收入家庭可能因感知到更多外部环境风险(如社区安全)并拥有更有限的资源来应对挑战,从而倾向于采取高控制、高保护的育儿策略作为一种适应性的风险管理(Ellwood-Lowe et al., 2025; Kim, 2019)。家庭文化取向也是影响过度保护行为产生与否的重要情境变量。具体而言,在崇尚个人自主和独立决策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强调子女主体性,父母的过度干预行为较少出现;而在强调责任与服从的文化氛围中,高水平介入常被视为关爱与尽责的表现,易导致过度保护行为产生(Pereira & Oliva, 2023; Van Petegem et al., 2022) (上述修改内容详见第2章2.3节,并用绿色字体标注)。

意见 3: 在神经机制方面,作者提到“母亲对痛苦和快乐婴儿均表现出杏仁核反应增强,表明杏仁核既促进保护性照护行为,也促进利他性母性反应”,可能的原因是杏仁核不同的神经元类群对婴儿不同情绪的反应;杏仁核也分为中央杏仁核,内侧杏仁核,基底外侧杏仁核,

包括杏仁核的延伸部分，这些核团的功能也不相同。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理解审稿人关于神经结构精细化阐释的建议。在神经机制部分,我们补充了杏仁核核团与神经元功能异质性的相关说明,指出不同核团及神经元类群在情绪与社会线索加工中的差异性参与,并明确该解释属于基于现有神经科学研究的整合性推论,以避免对杏仁核功能的整体简化。

杏仁核由多个功能不同的核团构成,包括基底外侧杏仁核、中央杏仁核和内侧杏仁核等,不同核团在情绪加工、动机调节及社会行为中承担着不同功能(Rolls, 2023)。此外,杏仁核内部不同神经元类群对情绪线索的反应特性亦存在差异。因此,母亲在面对婴儿痛苦与愉悦线索时出现的杏仁核激活增强,可能反映的是不同神经元或核团被选择性招募的结果,而非杏仁核整体功能的单一增强。我们完全认同审稿人的见解,并在修改稿中补充说明:上述关于杏仁核不同核团及神经元类群对婴儿情绪线索产生特异性反应的神经机制解释,主要源于对相关动物研究和人类神经影像学发现的整合与推论。目前,要将此类精细的细胞与环路机制直接验证于人类母性行为研究,仍需借助更先进的神经科学技术(例如,适用于人类的在体高分辨率成像、跨物种环路功能映射与计算建模)来对这些推测性解释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5章5.1节,并用绿色字体标注)。

意见 4: 作者提到“最终可能导致适应不良的养育模式被持续固化”,这种神经机制是否与神经的突触可塑性有关? 建议作者应该加入突触可塑性的文献。

回应: 我们同意审稿人关于机制层级深化的建议。在神经机制讨论中新增了“过度保护行为的维持与突触可塑性”内容,引入突触可塑性及奖赏学习相关文献,探讨在反复情绪缓解—行为强化过程中神经环路可能发生的适应性改变。同时,我们明确指出该机制仍属于理论整合推断,有待未来实证检验。

针对该意见,我们在第5章神经机制讨论中新增了“过度保护行为的维持与突触可塑性”部分的内容,引入突触可塑性和奖赏学习的相关文献,探讨重复焦虑缓解—行为强化过程可能在神经层面促进保护行为维持的潜在机制,并明确其为有待进一步验证的理论假设。在讨论适应不良养育模式可能被持续固化的神经机制时,突触可塑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已有研究表明,当特定情绪状态与行为结果在反复情境中被不断配对时,相关神经环路可通过突触效能变化发生长期调整(Antonoudiou et al., 2024; Bocchio et al., 2017)。在母性养

育情境中，若过度保护行为的实施反复伴随焦虑或不确定感的暂时缓解，该过程可能通过奖赏相关神经环路被编码为“有利结果”，并在突触可塑性机制的作用下提高类似行为在未来被再次选择的概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关于突触可塑性直接参与母性过度保护行为维持的实证证据仍较有限，该解释主要基于成瘾负强化理论与母性行为奖赏环路研究的整合推演。未来研究应借助动物模型，整合在体电生理记录、光遗传学操纵及突触结构成像等技术手段，检验该假设性神经通路的因果关联与可塑性基础（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 5 章 5.3 节，并用绿色字体标注）。

意见 5：图表展示与阐释工作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文中虽表明图 1 呈现的是“情绪—认知—行为闭环模型”，但目前仅对图表中的要素进行了简单标注，既没有展示出完整清晰的图表内容，也未针对图表里各个环节之间的因果联系、符号所代表的具体含义展开详细解读。为使该模型更加直观、便于理解，建议补充完整图表内容，并增加专门的图表解读板块。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图表呈现与阐释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对图 1 进行了整体优化，并在正文中新增“图 1 情绪—认知—行为闭环模型示意与解读”专门小节（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图 1 下方，并用绿色字体标注）。图中完整呈现了母性焦虑驱动过度保护行为的“情绪—认知—行为”心理神经闭环模型。心理机制层以母性焦虑为起点，经情绪放大、认知偏差，驱动过度保护行为的执行与维持；神经机制层与之对应：杏仁核支撑情绪反应，内侧前额叶介导认知偏差，腹侧被盖区—伏隔核奖赏通路编码行为强化。左右双向箭头表示心理过程与神经环路的动态对应关系——心理活动依赖神经基础，神经环路变化也反塑心理体验。底部闭环箭头揭示系统自我强化的循环本质。图中虚线部分代表基于现有证据的理论推导，其确切的因果关系仍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图 1）。

意见 6：模型普适性验证的方向亟待进一步明确与细化：文中虽指出未来需对模型在亲生父母（如养父母、继父母）群体中的普适性展开检验，然而，对于非亲生父母的母性焦虑形成机制与亲生母亲之间存在哪些差异，并未作出清晰说明；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父亲焦虑和过度保护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文中仅仅提及父亲更倾向于鼓励孩子探索，却未深入分析父亲焦虑是否同样存在类似的闭环模型。基于此，建议补充相关研究方向，清晰界定模型普适性验证的具体维度以及相应假设。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的深入分析，我们认同审稿人关于模型外推边界需要明确的意见。在总结与展望部分，我们新增了“模型验证：不同照顾者角色的差异化假设”，明确区分了亲生母亲与非亲生母亲（养母、继母等）在焦虑来源上的本质差异——前者具有“生理基础”与“母职压力”的双重来源，后者则主要源于“母职压力”的单一路径；同时，系统阐述了父亲焦虑驱动过度保护行为的独特性，其触发焦点可能指向发展性成就、行为表现以学业监控与成就压力传递为主、负强化来源为不确定性消除（预期确认），与母性焦虑的“安全威胁—侵入安抚—焦虑缓解”路径存在一定差别（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6章6.2节，并用绿色字体标注）。

意见7：过度保护母性照顾下的子代和正常照顾的母性子代在未来社会交往和情绪调节方面是否也不相同？如果不相同，子代行为的变化到底是“过度保护”导致的还是遗传所决定的？

回应：我们高度重视审稿人关于因果归因风险的提醒。在第6章新增“代际影响：过度保护对子代发展的遗传—环境交互作用”小节，强调子代情绪与社会行为发展受到遗传倾向、亲子互动及其双向作用的共同影响，并明确指出不宜将子代发展结果简单归因于母亲个体行为，以降低单因果解释带来的理论与社会风险。

已有研究发现，与正常母性照顾下的子代相比，过度保护的子代在未来社会交往和情绪调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往往表现出更低的社交自我效能感、更高的社交回避倾向以及更依赖外部支持的情绪调节模式(Arslan et al., 2023; Buss et al., 2021)。具体而言，过度保护养育下的孩子在面对同伴互动或陌生情境时更易感到不安与退缩，缺乏自主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能力(Kiel & Buss, 2012)，并对同龄人表现出不太积极的社交行为，例如亲社会行为（即帮助、分享和安慰等）(Arslan et al., 2023)。此外，过度保护可能也会在情绪调节方面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孩子在处理情绪时依赖父母，而不是发展自主的情绪调节策略(Buss et al., 2021)。具体而言，过度保护强化了儿童的恐惧和回避倾向，并使儿童习惯于依赖照顾者调节痛苦情绪(Wu et al., 2019)，阻碍其自主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

关于子代行为的变化到底是“过度保护”导致的还是遗传所决定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简单的“过度保护”或“遗传决定”，而可能是过度保护与基因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母亲过度保护与儿童行为抑制的关联受血清素转运体（5-HTTLPR）基因型调节：携带两个低表达等位基因（S或LG）的儿童在过度保护下表现出更高的行为抑制，而携带LA等位基因的儿童则无显著影响(Burkhouse et al., 2011)。研究也进一步发现，

5-HTTLPR 基因型与童年期母亲过度保护的交互作用同样能够预测成年期亲密关系中的回避倾向,且成人亲密关系中的焦虑与回避水平随母亲过度保护程度的变化而共变(Bonassi et al., 2021),表明早期养育环境与遗传易感性的交互作用可能对个体的亲密关系质量具有持续性影响。因此,过度保护行为与子代发展结果之间更可能呈现遗传—环境相关与交互关系,而非简单的因果链条。然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证据仍较为有限,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结合行为遗传学设计与纵向追踪范式,更全面地揭示过度保护影响子代发展的复杂机制。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在文中“总结与展望”部分进行补充,明确指出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探索过度保护效应中“环境”与“遗传”的交互作用机制,以期更全面地揭示母性焦虑驱动过度保护行为对子代发展的复杂影响路径(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6章6.2、6.3节,并用绿色字体标注)。

参考文献:

- Antonoudiou, P., Stone, B. T., Colmers, P. L. W., Evans-Strong, A., Teboul, E., Walton, N. L., Weiss, G. L., & Maguire, J. (2024). Experience-dependent information routing through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 shapes behavioral outcomes. *Cell Rep*, *43*(7), 114489.
- Arslan İ, B., Lucassen, N., Keijsers, L., & Stevens, G. (2023). When Too Much Help is of No Help: Mothers' and Fathers' Perceived Overprotective Behavior and (Mal)Adaptive Functioning in Adolescents. *J Youth Adolesc*, *52*(5), 1010–1023.
- Arslan, L. B., Lucassen, N., Keijsers, L., & Stevens, G. W. J. M. (2023). When Too Much Help is of No Help: Mothers' and Fathers' Perceived Overprotective Behavior and (Mal)Adaptive Functioning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2*(5), 1010–1023.
- Bocchio, M., Nabavi, S., & Capogna, M. (2017). Synaptic Plasticity, Engrams, and Network Oscillations in Amygdala Circuits for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Emotional Memories. *Neuron*, *94*(4), 731–743.
- Bonassi, A., Cataldo, I., Gabrieli, G., Lepri, B., & Esposito, G. (2021).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Polymorphisms and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Regulate Adult Social Expectations on Close Relationships. *Brain Sci*, *11*(9). <https://doi.org/10.3390/brainsci11091123>
- Burkhouse, K. L., Gibb, B. E., Coles, M. E., Knopik, V. S., & McGeary, J. E. (2011).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otype moderates the link between children's reports of overprotective parenting and their behavioral inhibition. *J Abnorm Child Psychol*, *39*(6), 783–790.
- Buss, K. A., Zhou, A. M., & Trainer, A. (2021). Bidirectional effects of toddler temperament and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on maternal and child anxiety symptoms across preschool. *Depress Anxiety*, *38*(12), 1201–1210.
- Elgar, F. J., McGrath, P. J., Waschbusch, D. A., Stewart, S. H., & Curtis, L. J. (2004). Mutual influences on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hild adjustment problems. *Clin Psychol Rev*, *24*(4), 441–459.
- Ellwood-Lowe, M. E., Reyes, G., DeJoseph, M. L., & Frankenhuis, W. E. (2025). Caring for Children in Lower-ses Contexts: Recognizing Parents' Agency, Adaptivity & Resourcefulness. *Daedalus*, *154*(1), 52–69.
- Hwang, W., Jung, E., Fu, X., Zhang, Y., Ko, K., Lee, S.-A., Lee, Y. M., Lee, S., You, H.-K., & Kang, Y.

- (2022). Typologies of helicopter parenting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young-adults' game and social media addictive behavior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1(4), 1030–1044.
- Hwang, W., Jung, E., Kim, S., & Hadi, N. (2023). Can helicopter parenting be beneficial f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Front Psychol*, 14, 1097348.
- Kiel, E. J., & Buss, K. A. (2012). Associations among Context-Specific Maternal Protective Behavior, Toddler Fearful Temperament, and Maternal Accuracy and Goals. *Soc Dev*, 21(4), 742–760.
- Kim, H. H. (2019).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and youth suicide behavior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data. *Int J Public Health*, 64(2), 173–184.
- Nolvi, S., Bridgett, D. J., Korja, R., Kataja, E. L., Junttila, N., Karlsson, H., & Karlsson, L. (2019). Trajectories of maternal pre- and postnatal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nfant fear: Moderation by infant sex. *J Affect Disord*, 257, 589–597.
- Pereira, L. B., & Oliva, A. D. (2023). How empathy, perceived parental care, and overprotection indexes are affected by participants' sex: investiga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Curr Psychol*, 1–12.
- Rolls, E. T. (2023). Emotion, motivation, decision-making,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nd the amygdala. *Brain Struct Funct*, 228(5), 1201–1257.
- Santos, I. S., Matijasevich, A., Barros, A. J., & Barros, F. C. (2014). Antenatal and postnatal maternal mood symptoms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the 2004 Pelotas Birth Cohort. *J Affect Disord*, 164(100), 112–117.
- Van Petegem, S., Albert Sznitman, G., Darwiche, J., & Zimmermann, G. (2022). Putting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into a family systems context: Relations of overprotective parenting with perceived co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anxiety. *Fam Process*, 61(2), 792–807.
- Vigdal, J. S., & Brønnick, K. K. (2022). A Systematic Review of "Helicopter Parent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ront Psychol*, 13, 872981.
- Wu, C. L., Huang, Y. T., Wang, P. Y., & Chen, H. C. (2019).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gelotophobia among adolescents. *Int J Psychol*, 54(4), 548–556.

第三轮

审稿人 3 意见：作者针对本轮审稿人提出的全部意见均给予了逐条回应、系统修改，修改态度严谨、学术规范意识强，对核心概念、理论框架、神经机制、文化分析、模型边界、代际机制及图表呈现等关键薄弱环节均进行了实质性完善。修改内容逻辑清晰、论据充分、文献支撑到位，整体学术质量较一审稿有显著提升，已基本达到《心理科学进展》刊发要求，建议录用。作者引用的中文参考文献应该根据《心理科学进展》要求进行修改。

回应：衷心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与肯定。我们非常重视您对参考文献格式的

细致指正，并已严格依照《心理科学进展》的稿件格式规范，对所有中文参考文献进行了逐一核对与系统性修订，确保作者姓名、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期页码等各项要素的著录格式完全符合期刊要求（具体修改内容详见第3章3.1节第3段、第5章5.1节第1、2段、参考文献部分，并用紫色字体标注）。经此次全面修订，全文参考文献的规范性已得到切实保障，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使论文得以进一步完善。

编委 1 意见：

同意发表

编委 2 意见：

没有进一步的修改建议。同意各位审稿老师的意见。

主编意见：

稿件经过多位专家的审阅，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达到了发表水平，同意发表。